

# 翻译、性别与现代身份的建构\*

## ——论20世纪初叶中国女性译者翻译中的性别政治诉求

罗列

(西南财经大学 经贸外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关键词:女性译者;性别政治;文化身份

摘要 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性别秩序在启蒙知识分子的强国话语和西方现代女性观的输入中遭到挑战,女性译者通过文学翻译积极参与了时代性别话语的建构。她们在翻译活动中关注两性之情、女学目标、婚恋问题、女子贞节、女性生育、女子独立人格等时代焦点问题,在宏大的历史主流叙事中插入了女性自身的性别政治诉求,女性关怀立场十分突出。在审视他者、建构自我的过程中,女性译者表现出对新潮思想中潜在危险所具有的洞察和冷静判断,对塑造女性现代身份的独立思考。

中图分类号:J04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3)02-0070-07

Translation, Gend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dentity: Search of Sexual Politics by Women Translators in the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LUO L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n Economics and Trade a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Key words: woman translators, sexual politics, identity

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 views on wo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on strengthening nationally among pioneering intellectuals, women translato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discourse by means of their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ir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ir gender awareness and concern for woman can be witnessed in their discussion of the major gender issues at that time, including the legitimacy of love, the goals of women's learning, marriage, woman's chastity, views on childbearing and the ways for women to pursue independence. In the midst of various gender discourses, they did not follow mainstream thinking blindly but hold an objec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modern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men.

### 一、引言

晚清以降,在面对世界新秩序的焦虑中,启蒙知识分子将改造中国女性作为强国的手段,致力于塑造符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新女性。在男性知识分子

倡导新女性话语的同时,女性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立场,参与了性别话语的建构,翻译是她们诉诸的重要途径之一。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sup>①</sup>1898年至1930年间,目前

作者简介:罗列(1972-),女,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

\*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性别视角下的译者规范”(项目批准号:11FYY018)资助。

①有关中国近代第一个女性译者群体的产生,笔者在《从近代女学析中国第一个女性译者群体的生成》(《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年第1期)中有详细论述。

能确定身份且有署名译作发表的女性译者共 48 位,译有文学作品 170 种、非文学作品 24 种。她们大多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近代女权启蒙运动推动的女学发展中,又接受了新学的影响和教育,更有不少女性译者拥有留学海外的经历。穿越在不同的文化和地域空间,女性译者不断实现对原有性别身份禁锢的越界,从私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成长为近代第一批先觉女性知识分子。女性译者的翻译活动是她们的积极介入公共空间、参与时代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译者群体虽然在整体上受到时代风尚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传统形成的第二性的文化身份,决定了她们作为译者群体中的亚群体存在的特性。“性别差异不仅是一直作为描述翻译的隐喻,也一直存在于真实的翻译实践中,影响着女性在特定社会和历史形态中如何理解并进行她们的书写活动。”<sup>[1][2]</sup>对于中国 20 世纪初叶的女性译者来说,她们跨越千年性别隔离的文化之旅,势必在其翻译活动中留下深深浅浅的性别差异的痕迹。本文将从女性译者所作译者序跋及译本主题两个层面,透视其翻译活动中的性别政治和现代身份建构的诉求。

## 二、翻译与性别政治

建构主义者认为,“女性身份(feminine identity)是一种历史建构,因此‘女性’作为一个类别,是复杂话语过程的产物”。<sup>[2][12]</sup>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于 1970 年出版《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揭露父权文化不但在社会政治法律上,并且还通过神话、宗教及文学等无处不在的话语对女性进行殖民。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作为一个性别,其身份一直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和规约,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等级规范让女性言说自身诉求的可能空间十分狭小。传统女性书写在“内言不出于阃”的限制下,体裁和主题均很单一。虽然文学话语侧重于委婉表达女性的内心情感,但却多限于哀怨而缺乏对男权文化的犀利审视。翻译作为异质文化的交接地带,必然成为不同观念冲突与融合的地带。中国 20 世纪初叶的女性译者在近代女权启蒙的背景中出现,翻译中对各类新文本类型和主题的尝试,赋予她们打破性别禁忌、跨越文化疆界的权力。从私领域到公共领域,从本土到异域,从沉默者到言说者,在

从原有身份的一次次蜕变中,翻译极大拓展了女性译者的话语空间。不少女性译者表现出性别意识的自觉,面对域外文学文本中呈现的不同的性别观念,女性译者凭借翻译,直接或间接地审视中国现有的性别权力机制,追问何为“新女性”,以尊重女性自身体验为出发点,对新女性身份的内涵进行剖析和解读,在男性知识分子的新女性话语中插入了女性自己的诉求。翻译成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政治,言说心目中理想性别关系、构想新型性别制度的场域。

## 三、女性译者的性别政治诉求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在受女性主义影响的文化语境里出版的译作,元文本(meta-text)都带有显著的‘译者影响’特征,这是译者作为有性别意识的个体留在文本里的印记”。<sup>[3][35]</sup>对于中国 20 世纪初叶的女性译者而言,她们是近代中国女权启蒙思潮的时代产物,虽然对性别秩序的认识仍处于新道德与旧伦理的间隙之中,还不是当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译者,但她们中的不少人具备了性别意识的自觉,通过运用写译者序跋或译者识的方式,或者通过对译作主题的选择,来表达自己的性别政治诉求,并期待读者通过阅读来建立新的两性观。

### 1. 为言情正名

传统女性文学中不乏写情的题材,但以诗词为大宗,表现方式均委婉含蓄,女性作者以小说为体裁的言情书写是在 20 世纪之初,以翻译小说开始的。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因小传》的风行,既引起时人广泛称颂,也招来严厉批评,传统伦理与现代爱情观和性别观围绕着言情小说的译介发生着剧烈冲突。

闽中才女薛绍徽(1866-1911)是第一个运用译者序来表达自己翻译目的和性别观念的女性译者。薛绍徽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修习儒家传统经典和“女学”规范,深受传统儒家伦理浸染,后在丈夫陈寿彭的影响下了解新学,并合作翻译,翻译作品 4 种。薛绍徽和陈寿彭合译的“爱情小说”《双线记》(*A Double Thread*)出版于 1903 年,在选择翻译该作时,薛绍徽夫妇对该作的题材发生分歧。陈寿彭认为“儿女私情”之作对于中国没有益处,不宜翻译,这十分吻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倡导的文学翻

译规范。薛绍徽却在其译者序中坦言自己喜欢言情小说,并借典籍中的言情传统,肯定“言情”主题本身的合法性。并指出“故准风俗于礼经,观乐无讥鄙下;通人情以王道,删诗何碍郑音哉”<sup>[4](P124)</sup>情与礼法并非势不两立,王道本乎人之常情,重人情之义,行礼仪之事。薛绍徽引经据典,重新阐释了情与礼之间的关系,人情与王道原本一体,消解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此外,薛绍徽还提出:“贵易交而富易妻,岂得心心相印?”<sup>[4](P123)</sup>提倡男女之间须彼此忠贞,才能获得心心相印的感情。薛绍徽并未像林纾借用启蒙话语来诠释言情的正统性,而是对言情主题毫不讳言。她没有因为丈夫的看法而放弃对言情小说的翻译,还为言情正名。与林纾借助启蒙话语不同,薛绍徽对言情的正名是从追溯典籍中的言情传统开始,说明自古皆有言情传统,言情本身并无可鄙之处。在男女私情不为正统礼法所容的传统中,薛绍徽积极参与“言情”的书写,作为深受传统儒家伦理浸染的女性,这无疑与薛绍徽坚守的传统道德有所背离,<sup>[5](P262-263)</sup>但却更清晰地呈现了在礼法约束之下女性对“情”的渴求,更接近女性真实的内心感触。

## 2. 女学观

近代中国的衰落让男性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启蒙话语中将女性视为“分利者”,认为女性的“缺教”、“无业”<sup>[6](P88-89)</sup>是导致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20世纪初年,女学之兴带来了不同教育宗旨的争论,主要焦点为女子应当成为具备新知的贤妻良母,还是成为“女国民”和女豪杰。报刊杂志上出现了很多介绍西方女性的传记作品,启蒙知识分子尝试借鉴西方女性典范,来重塑中国女性,并将之作为女学的重要内容。

薛绍徽与陈寿彭合译的《外国列女传》算得上是第一部系统译介外国女性事迹的作品。薛绍徽在序言中阐述了选择译介该作的缘由:“迩来吾国士大夫,概念时艰,振兴新学。本夫妇敌体之说,演男女平权之文,绍徽闻而疑焉。夫遐荒远服,道不相侔,闺范闾仪,事尤难见。登泰山而迷白马,奚翅摸槃,游赤水而失玄珠,有如买椟。适绎如夫子载搜秘笈,博考史书,因嘱凡涉女史记载,递及里巷传闻,代为罗织,以备辑录。”<sup>[4](P122)</sup>

译介《外国列女传》为薛绍徽主动倡议,但不同于男性启蒙知识分子推崇西方女杰来塑造中国新女性的主流性别话语,薛绍徽译介外国女性事迹的缘由,在于她对提倡西学的“士大夫”所介绍的西方性别观念持怀疑态度。薛绍徽对男性知识分子宣扬的“夫妇敌体”和“男女平权”不是盲目接受,而是以审慎的态度,要求陈寿彭搜集相关资料,并仔细考察和研究,全面了解西方的“闺范闾仪”,经过甄别才能作为中国女性的借鉴。在男性知识分子强大的启蒙话语面前,薛绍徽保持冷静求真的态度,体现了知识女性在面对女学目标的思考中,不盲目趋附主流话语的独立创见。薛绍徽选择译介西方女性,目的是为了“藉其镜烛,显我文明”。<sup>[4](P122)</sup>“镜与烛的隐喻包含了双重的审视。一方面镜与烛凸显出被映照者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为之正名。”<sup>[7](P74)</sup>薛绍徽译介国外女性事迹,不是试图全然否定中国女性,以西方女性作为中国女性模仿的楷模,而意在以西方女性为“镜烛”,彰显中国女性美德,在维护中国传统、批判性地接受西方性别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性别关系。薛绍徽的翻译目的揭示出译者作为知识女性,不是西方价值体系和中国男性启蒙家的盲目追随者,她站在女性的立场,注重对女性价值的肯定,以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建中国女性的现代身份。

教会女校学生郑申华发表译作14种。所译新剧《蕙波》1917年刊发在《妇女杂志》第3卷第8号上,该剧围绕女子是应该勤于纺织,还是应该读书具备学识的争论展开。剧中的三位姑母“长唇姑”、“阔指姑”和“扁足姑”和妈妈都勤于纺织,认为“纺织是女子当做的事”,而喜欢读书的蕙波“真羞辱亲友”,蕙波反驳道:“我虽然不敢轻视纺织。这诗词是文学上的一种美术。也是我最喜欢的。纺织是一种生计。叫女子练习勤劳的方法。文学是有调节勤劳的作用。可以陶淑性情。增进智识。你们只会纺织。不懂文学。难道就算尽女子的能事么。”<sup>[8](P9)</sup>蕙波认为对于女子而言,纺织与读书并不矛盾,都应是女子的职责。她们的争论引起了街上王后的注意,王后让蕙波进宫,在三日内若纺完三房间的麻,即可聘蕙波为太子妃。在三位姑母的帮助下,三房间的麻在规定时间内纺完。但太子的择妃要求却是“纺织固是妇女所当为

的。然更不能不知书识字。”<sup>[8](P9)</sup>慧波告诉太子纱并非是她纺的,“我虽然也会纺纱,却最喜欢文学”,<sup>[8](P9)</sup>最后得到太子的青睐,聘为太子妃。该剧宣扬了一种新的女性审美观和价值观,即勤于劳作与知书识字都是女子应当具备的品行,与传统贬低女子才学的性别观相背离。虽然这一价值标准合法性的获得,是通过“太子”这位居于权力结构顶端的男性的认可。郑申华选择翻译该作,借用男性权威的影响力,肯定了女学的价值,实现了对新女性观的宣扬。

### 3. 现代婚恋观

中国传统社会规约了女子的“三从四德”,在婚姻中确立了“夫为妻纲”的准则,婚姻中女子没有自主和平等的权利。而随着现代性别观的启蒙,如何在婚恋中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也受到女性译者的关注。

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的薛琪瑛是清末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1838-1894)的孙女,发表译作12种。在她发表的第一部翻译作品、王尔德的剧作《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里,作有“译者识”来阐明自己的翻译目的:“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特译之以饷吾青年男女同胞。”<sup>[9](P1)</sup>作为译者,薛琪瑛十分关注该剧中展现的两性关系,把婚姻中的男女两性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提倡夫妇之间相互宽容,以怜爱之心对待对方的过失,并希望借此作向目标语读者传递两性之间应当相互“仁爱宽恕”的观念,以建构和谐、互助、平等的新型婚姻关系,这无疑是对传统伦理中规约的男尊女卑价值体系的反叛。在以后的翻译活动中,性别问题一直是薛琪瑛关注的重点。作为译者,她期待通过翻译,向中国男女青年传递正确的婚恋观念。

翻译言情小说的流行,输入了新的性别观和爱情观,对传统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和包办婚姻形成了冲击。但在巨大市场利润的诱惑下,译者和出版商对原文本的选择良莠不齐,不乏滥竽充数之作。薛琪瑛明确提出了谨慎选择原语文本以帮助中国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的翻译选材方策。1930年薛琪瑛在为翻译《蓝窗》所撰写的序言中道:“现今青年男女都喜

讲爱情,读爱情小说,看爱情影片,视爱情若生命。一般投机的书局为牟利起见,便层出不穷的印行此类书籍以供阅者的要求。然所出的大概提倡浪漫主义,偏重物质,而不能节之以礼;血气未定的青年读之,往往陷入迷途,贻害身心,实在不浅。”<sup>[10](P1)</sup>

薛琪瑛批评当时出版商利用青年对爱情的热烈向往,不加选择地翻译出版爱情小说,这样会让年轻人迷失自己,危害其身心健康。薛琪瑛倡导一种建立在精神相通、不以物质为目的基础上的爱情观:“因人类为万物之灵,宜具专一纯洁的感情。不过人生欲求一情侣,倒还容易;所最难得的,乃是重在道义的精神之交。自古士为知己者死,皆因情有独钟,不是偶然能发生的。所以夫妇之爱,亦必重在精神,而后有价值,无中途易辙之患。”<sup>[10](P1)</sup>她希望通过翻译此书让青年男女“明晓爱情的妙谛,感悟人生的真乐”,<sup>[10](P1)</sup>劝告“青年不要轻于用情,自贻伊戚。若不得志同道合,诚意相孚的真爱,宁可缓谈婚姻问题,而寄情于其他有价值之事业,因为感情断不能出于勉强的”,<sup>[10](P2-3)</sup>她希望青年们读了该书,“可知自由恋爱之真价值”。<sup>[10](P3)</sup>薛琪瑛希望通过精选原语文本,翻译内容健康的作品,让中国青年男女认识到何为真正的自由恋爱,其价值在于把爱情建立在双方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强调恋爱双方的精神交流和相互的忠贞,才能实现爱情的长久。

沈性仁(1896-1943)曾留学日本,共发表译作17种。1922年翻译英国剧作家汉更的《常恋》(The Constant Lover),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10号。该剧中的男主人公西西尔·哈勃顿(Cecil Harburton)以问路为由认识了姑娘爱维连·利福思(Evelyn Rivers),两人在树林中约会相见。西西尔宣扬恋爱的快乐,“一个人要是不爱人,活着有什么趣味?我是不断的与人家有恋爱的”,认为结婚并养育子女是“十分愚笨的人”,<sup>[11](P16)</sup>他推崇“不受束缚,不负责任,也没有可怕的小房子,没有小鸟在巢里叫吵”<sup>[11](P17)</sup>的生活,以享受爱情的名义,推脱所有的生活责任。在西西尔的爱情观里,把女性看做恋爱和享受乐趣的工具,是制造“雅韵的事”的对象,却不愿意承担任何职责。这与爱维连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爱维连没有因对方的甜言蜜语和亲吻而失去判断力,她

认为“一个男子如果不跟这个女子订婚 就不应该与她发生恋爱”,<sup>[11](P16)</sup>爱应该是认真的、永久的。经过痛苦的抉择,她拒绝了西西尔,去车站等候认真做事、一直爱着她并向她求婚的黎吉(Reggie)。在五四时期追求婚恋自由的呐喊声中,一些男性以“爱情”和做“新女性”的名义鼓动女性,让女性失去冷静的洞察,陷入危险的人生境遇。《常恋》一剧中,女主人公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恋爱,拒绝不负责任的两性关系,反对游戏人生,无疑是对滥用自由和爱情名义误导女性的反驳。沈性仁选择翻译这样主题的剧作,体现着译者对作为五四时代呼声的“婚恋自由”口号的犀利审视。剧中女主人公最终的选择,无疑是译者希图传达给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告诫之声。

五四时期,自由恋爱被新青年们视为反抗传统父权制度、追求独立自由的重要途径,但在激越的实践中隐藏着对自由恋爱的误读和滥用的危险。薛琪瑛和沈性仁在翻译中尝试解释爱情的真实内涵,启发中国读者建立健康的现代性爱观念。

#### 4. 贞节观

传统中国家庭允许一夫多妻制,妻妾共事一夫,要求这些女子彼此和谐相处,不可相互妒忌,夫死之后妻子为其终生守节被作为女德典范来颂扬。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诗人兼批评家与谢野晶子(1878-1924)的《贞操论》,由此开启了五四贞操讨论热潮,之后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抨击了当局的“节妇”、“烈女”观,揭露了传统儒家伦理对性别角色定位采用的不平等的双重标准。

1923年,沈性仁译俄国安东·契诃夫(Anton Tchekoff)著的《蠢货》,发表于《太平洋》第4卷第2号。该剧的女主角褒白夫人丈夫去世,虽然其丈夫并不忠实于婚姻,但褒白夫人依然立志守节,足不出户,不见任何外人。直至一位退伍军人史密诺夫闯入,来讨要褒白夫人的丈夫所欠债款,两人在冲突中产生感情,褒白夫人最终接受了新的感情。该剧表达

了对女子贞节观的不同看法,剧中仆人路加劝告褒白夫人“一个人不能永远悲哀哭泣的!”“想起来你的丈夫也不配你这样哭他!”<sup>[12](P2)</sup>希望她在年轻美丽时及时选择新的生活。这一主题鼓励女性放弃夫死守节的观念,珍惜生活,与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对贞节的讨论和对“节妇”、“烈女”观的抨击相呼应,倡导女性放弃守旧观念,把握生命和生活的真谛。

#### 5. 生育观

中国传统社会倡导多子多福的生育观,而女子在婚姻中为家族孕育后代,尤其是男性子嗣尤为重要。婚姻中女子的地位往往跟生育密切相关,生儿育女被视做女性的天职和美德。五四时期,传统的生育观在西方现代人口论和生育观念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变迁。《妇女杂志》1920年开始发表文章探讨节育与女性生理健康与自由之间的关系。<sup>②</sup>1922年4月美国山格夫人(Mrs. Sanger Margaret, 1879-1966)在北大做了一场题为《生育制限的什么与怎样》的演讲,胡适做翻译,张竞生陪同,引发了对节制生育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妇女解放以及社会道德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1925年薛琪瑛译的《产妇》(*Maternity*)在《京报副刊》上连载,原作者为法国剧作家白立阿<sup>③</sup>(Eugène Brieux, 1858-1932),经萧伯纳夫人的英译转译。该剧支持女性节育,在该剧的最后一个场景,展现了“已经没有足够食物喂养第一个孩子的贫困女性,愤怒反抗生育更多的孩子”。<sup>[13](P111)</sup>《产妇》一剧中,女主人公露仙(Lucie)在结婚的四年里已经生育三个女儿,希望能节制生育。而其丈夫白利那(Brignac)却想生个儿子,并在妻子怀孕生子期间与其他女性有染。露仙对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得不到尊重、不能自主而发出抵抗的声音,称“这是奴隶的事”,“你到底不顾我的身体,与所受的种种痛苦,使我一年不得安居。我的生活由你擅自处分”。<sup>[14](P9)</sup>女性因为没有生育的自主权,沦为生育的工具,身心遭受创痛,丧失女性的独立人格。虽然薛琪瑛没有撰写相关的副文

②1920年《妇女杂志》第1号上刊登读者黄秀芬的来信《生育的机器要做到几时为止呢》,信中讲述了自己不断生育带来的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希望能了解节育方面的信息。同年《妇女杂志》第9号上刊登金仲华的《节制生育与妇人生理的解放》一文,指出女性生理上的不解放将妨碍女性在其他方面的解放。

③现常译作尤金·百里欧。

本阐释选择翻译该剧的原因,但对这一主题剧作的翻译实践,展现了译者对女性最深刻的关怀,反驳了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和生育工具的传统观念,体现着译者鲜明的性别意识和女性关怀意识。

#### 6. 追求女子独立人格:出走还是归来

五四高扬个性和尊重个人意志的思潮中,将女性建立独立人格提上了历史日程。在《新青年》译介易卜生的戏剧《娜拉》后,离家出走去追求做人尊严的娜拉成为女性觉醒的最高标志,备受推崇。然而娜拉走后怎样也引发了新文化先驱们的争议。这一时期的翻译中,沈性仁表达了作为女性的冷静思考。

沈性仁的第一部译作是1918年《新青年》上开始连载的王尔德戏剧《遗扇记》。该译作前附有其丈夫陶履恭(1888-1960)所作的《序言》,提及“新青年登过薛女士所译的《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可惜没有登完。此外再没有提及过王尔德的名字了”。<sup>[15](P336)</sup>薛琪瑛所译《意中人》发表后,招致胡适批评,认为王尔德作品并不适合于当时目标语文化的需求,对王尔德戏剧的译介陷入了暂时沉寂。“如果译者冒险将会得到回报(经济的、象征性的或者社会的),那么译者将可能采取冒险的方式,而不是转移风险。”<sup>[16](P325)</sup>作为译者的沈性仁,在目标语文化对王尔德知之甚少,并且在薛琪瑛翻译王尔德戏剧受到负面评价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翻译王尔德戏剧。陶履恭介绍了沈性仁翻译《遗扇记》的起由:“今年九月性仁在病院里,闷极无聊,我又没有工夫去陪伴他,乃请王尔德的《遗扇记》给他解闷。性仁喜欢这出戏里的故事,出院后就把他译出来。”<sup>[15](P337)</sup>沈性仁虽然在丈夫的推荐下接触到该剧作,但她对该剧的翻译缘自对该剧的喜欢,对原作的选择冒着被评论家批评和否定的风险,彰显了女性译者的独立审美精神和文化态度。该剧1923年由洪深(1894-1955)改译为《少奶奶的扇子》,1924年搬上舞台演出,引发了关于女性解放是应该模仿娜拉出走,还是应该像少奶奶一样回到婚姻家庭秩序之中的争论。<sup>[17](PP46-48)</sup>沈性仁冒着被批评的风险选择翻译该剧,译介了一个因冲动而出走,却因冷静而回归家庭的女性形象,丰富了五四中国对女性解放的思考。

1924年,沈性仁翻译了英国詹姆斯·巴里

(James M. Barrie) 著的《十二镑钱的神气》(The Twelve-pound Look),发表于《太平洋》第4卷第6号。该剧中海理的前妻喀德在14年前留下一纸书信弃他而去,海理一直认为前妻是跟某个男子私奔,他自认为是一个好丈夫,拥有成功,把妻子“打扮得很阔”,<sup>[18](P21)</sup>妻子在他那里享受着“种种幸福”。<sup>[18](P19)</sup>14年后二人意外见面,喀德成为了一名打字员,而海理即将受封为爵士。在海理的追问下,喀德告诉了离开他的真实原因,她厌倦打扮得珠光宝气宴请客人的生活,也反感海理不断追逐成功的价值观,她眼中的海理“无情”、“粗暴”、“轻看弱者”、“看不起女子”,于是她决定“如果我一旦有了可以赚十二镑钱的能力;我便能一个人投身到社会上去;所以一等我赚到了便与你脱离了”。<sup>[18](P23)</sup>喀德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选择了在海理眼中“可怜孤独的穷鬼”<sup>[18](P31)</sup>的日子,却获得自信和自由。这一主题跟娜拉出走极为相似,妻子不甘成为丈夫炫耀的物品,希望获得独立的精神和做人的尊严。娜拉在与丈夫的冲突中突然下定决心放弃做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去追求做人的生活。喀德与此不同,她经历了一年的思考,并租了打字机自学,在6个月里赚到了十二镑钱,偿清了打字机的账目,在充分思考和准备的条件下,喀德才“自由走了”。<sup>[18](P25)</sup>在后来的14年中,喀德靠打字获得独立的生活。女性的独立不是靠一时的意气 and 冲动,需要具备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充分准备,这对于五四时期“娜拉走后怎样”,以及女性获得独立意志是应该出走还是归来的激烈讨论,提供了一种解答。

#### 四、结语

20世纪初叶急剧变化的社会语境中,中国女性的生存样态也随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迁。知识女性作为时代的先觉者,敏锐地感受并主动参与着从传统到现代裂变的历史进程。启蒙知识分子赋予翻译特殊的历史使命,将翻译作为引进西学、启蒙大众和变革传统的工具与手段,翻译目的带有强烈的功用色彩。女性译者的翻译目的并不脱离时代的主潮,但其中也彰显着知识女性审视自我与他者的独特眼光。在某种意义上,绝大多数的书写都带有政治意味,要么与书写产生的语境保持一致,要么有意识地逾越它、反映它,或者针对特定的读者群以达到劝

告、诱导或施加其他影响的目的。<sup>[19](P9)</sup>女性译者的翻译活动中,注重女性的自我建构,尊重女性自身的体验,强调女性的在场,性别政治的诉求十分突出。她们通过翻译关注并积极参与时代性别话语的书写,对两性之情的肯定,对女学目标的审视,对现代健康婚恋观的传播,对女子贞节的探讨,对女性生育的关怀,对女子独立人格的追求,在宏大的历史主流叙事

中插入了女性的声音。在审视他者、建构自我的过程中,既反映女性突破传统性别秩序桎梏的勇气,也表现出对新潮思想中潜在的危机所具有的洞察和冷静判断,并不盲目趋附于主流话语的言说,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卓越见识。

### [参考文献]

- [1]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2]Godayol, Pilar. Frontera Spaces: Translation as/like a Woman[A]. In José Santaemilia, ed.. *Gender, Sex and Translation: The Manipulation of Identities*[C].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5.
- [3]von Flotow, Luise. Feminist Translation: Context, Practices and Theories[J].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1991, 4(2).
- [4]薛绍徽著,林怡点校.薛绍徽集[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 [5]罗列.女翻译家薛绍徽与《八十日环游记》中女性形象的重构[J].外国语言文学,2008,(4).
- [6]梁启超.论女学[A].变法通议[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7]Qian Nanxiu. "Borrowing Foreign Mirrors and Candles to Illuminate Chinese Civilization": Xue Shaohui's Moral Vision in the Biographies of Foreign Women[J]. *NAN NU*, 2004, 6(1).
- [8]郑申华译.意波[J].妇女杂志,1917,3(8).
- [9]薛琪瑛.意中人·译者识[J].青年杂志,1915,1(2).
- [10]朱薛琪瑛.蓝窗·序(第三版)[M].上海:广学会,1941.
- [11]沈性仁译.常恋[J].小说月报,1922,13(10).
- [12]沈性仁译.蠢货[J].太平洋,1923,4(2).
- [13]Shaw, George Bernard. Preface[A]. In Eugène Brieux. *Three Plays by Brieux: Maternity; The Three Daughters of M. Dupont; Damaged Goods*[C].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5.
- [14]薛琪瑛译.产妇[J].京报副刊,1925,(228).
- [15]陶履恭.遗扇记·序言[J].新青年,1918,5(6).
- [16]Pym, Anthony. On Toury's Laws of How Translators Translate[A]. In Anthony Pym, Miriam Shlesinger, and Daniel 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C].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17]罗列.出走与归来:从易卜生与王尔德戏剧中出走女性的译介看“五四”女权话语的多样性[J].妇女研究论丛,2008,(4).
- [18]性仁译.十二镑钱的神气[J].太平洋,1924,4(6).
- [19]von Flotow, Luise. Transl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Culture[A]. In Renate Blumenfeld-Kosinski, Luise von Flotow and Daniel Russell, eds.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C].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1.

责任编辑 含章